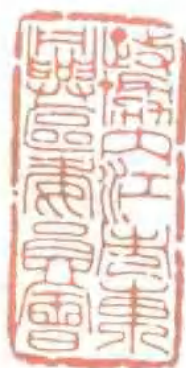


2/10

第五期

(总第二十一期)

内江市
文史资料



内江市
东兴区
文史资料

第五期

(总第二十一期)



主 审: 刘正喜

主 编: 熊朝学

副主编: 刘兆火

陈建国

编 校: 尤 勇

封面题字: 李代权

封面篆刻: 黄隆俊

内江市东兴区文史资料

第五期 (总第二十一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委员会编

内江市东兴区川剧团印刷厂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印刷

图书准印证: 内江字第(005)号

目 录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内江县民在抗战中	蓝 炯 (1)
抗日战争时期内江县人民的爱国活动	黄海欧 (20)
记一家穷人对抗战的奉献	熊宣虎 (32)
名 姬	阳 光 (34)
家父在南京保卫战中	陈苏皖 (38)
在三台县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点滴回忆	刘正喜 (42)
东兴区侨联的十年(一九八四年——一九九四年)	季 华 (51)
苏家乡农会武装击毙持枪匪首喻光辉	易耿光 (57)
内江县的公路建设	王朝纲 (61)
内江县氮肥厂初期筹建回顾	夏江河 (66)
内江县下放小机榨糖厂简况回顾	刘宗礼 (74)
卓有成效的探索	
——内江县第一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纪实	汪丽华 朱安荣 (77)
内江县洪灾及抗洪救灾纪事	史鳌法 (94)

堰口河的变迁·····	王光槐(101)
罗象嵩兴办大洲中学·····	蓝 炯(105)
从谋求自身解放到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王纯碧女士 ·····	刘万奎(110)
社(乡)办电技班效果好·····	甘利荣(117)
东乡晚清举人王绍唐轶事趣闻·····	王光槐(121)
“内江老叟”陈无垢·····	郭开云(129)
内江般若寺明末高僧丈雪《行实》碑·····	罗仁忠(132)
范长江与“李太白” ·····	梅晓初口述王德润笔录(135)
漫谈内江“八大名坟”·····	黄世杰(139)
我的大家庭·····	安恩德(146)
内江梨园春秋《川剧传人点将之五》 ·····	温余波 王德润 蒋政伦(153)
内江市(东兴)地名谣谚小释·····	洪 庐(157)

内江县民在抗战中

蓝 炯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中流砥柱，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面对无比凶残的日本侵略军，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前赴后继，无私奉献，抗战到底，不仅粉碎了日寇妄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而且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巨大的民族牺牲，赢得了这场战争的彻底胜利，一洗中国近百年的国耻。在这场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里，作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内江县民，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内江是个好地方

抗日战争期间的内江县，包括着今内江市市中区和东兴区的全部辖区，地处四川盆地中南部的沱江中下游，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幅员面积 1566 平方公里，人口 50 多万，耕地 100 多万亩。县城居沱江江畔，三面环江，人口 5 万多，城区分布在沿江一片，西北起岛湾，沿江东南下，约 6 里至河街口（今团结粮店），东南起河坝街口北入文英街，至华胜剧院（今影都）转南至南门（今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外

口)西南从上南街口(今内江市六中)至华胜剧院转半坡井(今街心花园),出入西门叠象街至西门桥,与沿江的桂湖街相接;城中为大西街、小西街、南街、箭道街、东坝街等。城东跨江为东兴镇。城区面积不过两平方公里,房屋多系串木结构,一楼一底,上覆以瓦。县城与县域虽然不大,就全国而言,犹如弹丸之地,但其位居成渝要冲,交通方便。沱江航运,上至金堂,下达泸州、重庆,为川中水上运输大动脉;成渝公路由西北向东南横穿县境,从县城至重庆、成都各为200余公里,是理想的中间站;沿内(江)乐(山)公路,由县城向西仅45公里就是自贡市区,使盐都自贡与甜城内江紧密相连。县东10公里渡口为犍木镇,是成渝大道上的重要关津,享有“落城第一关”的美名。县内盛产蔗糖,产量为全省之冠,桔糖与糖蜜又是生产酒精的主要原料。内江县民具有中华民族反抗外侮的光荣传统,具有强敌面前顽强斗争和困难环境敢负重任的革命精神。

抗战中,由于沿海诸省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内江成为省内的战略要地,内江县民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伟大的抗日战争,直至最后胜利。

二、灾荒之年遭国难

抗日战争以前,内江县民就灾难深重。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国篡权和一九一三年熊克武于重庆兴师讨袁失败以来,陷入长达二十年的军阀混战,尔争我夺,战祸连年,加之,政权更叠酷似走马灯,匪盗抢掠如梳篦,地方生产荒废,经济凋零,赋税沉重,内江县民如坠万丈深渊,四处逃离,朝不保夕。一九三

五年，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结束军阀混战，川政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但到一九三六年秋，四川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天旱，内江连续八个月未下过一场透雨，小春作物种下后，不发芽，不长苗，到第二年春天，好些种子从地里刨出，还是下种时的样子，水田普遍干旱龟裂，大春作物无法播种与栽播，农业损失极其严重。据当年四川省建设厅的《农情报告》述：内江县水稻受灾损失达 93.55%，高于全省 49 个百分点，为全川最严重的受灾县之一。然而，国民政府不施救济，除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征调民工修筑内乐公路外，就是鼓吹各专、县设坛祈雨。结果，广大农民生活无着，酿成大饥荒，农民靠吃树皮、草根、野菜充饥，还有很多灾民因饥饿难忍，找不到东西吃，就挖白泥吃，称为“吃仙米”，吃时胀了肚子，屎却拉不出来，县民因饥饿死者，不计其数，四处路有尸骨。时称这次大灾荒为“丙子丁丑大天干”，又称“丙于子丁丑”。内江县民就是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惊闻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中国的消息。

三、以我血肉卫中华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制造了“芦沟桥事变”，接着向华北、华东、中南情省大举进攻，叫嚣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浴血牺牲，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可是，由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致大片国土很快沦于日寇之手，国民政府也被迫从南京迁汉口，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再迁重庆。这时，大批外省人（时称“下江人”）逃来内江，向内江人民倾诉日寇对中国人民实行“三光”（杀光、抢光、烧光）政策的滔天罪行，激起内江县民的无比义愤，逐步认识

到只有抗日救亡，才是唯一出路。

抗战中，作出最大奉献者，乃是抗战军人及其家属。早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内江县县长陆维周即向全县各区联保主任（乡长）以上人员报告一月来抗战的形势，提出了“国难当头，要以巩固后方为要务”的口号，部署加紧组织与训练民众，共赴国难的任务。九月二十一日，全县举行壮丁大演习，广大壮丁义愤填膺，杀敌呼声震撼大地。接着，进行紧急征兵，至次年十月，应征入伍者 6816 名，占甲级壮丁总数的 36.25%。在八年抗战中，全县共征兵 38297 名。征集中，有相当部分应征者是志愿从军的，尤其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发动的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活动，获得多数知识青年与家长的热烈响应，甚至一些公教人员，也纷纷表示志愿从军，杀敌救国。不到一个月，征集入伍的知识青年 295 名，其中大洲中学学生入伍的 30 多名。一次，重庆征集到印度的远征军（学生）路过内江，使内江学生要求应征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仅次晨在内江女中操场欢送远征军上车，就有两名大洲中学的学生爬车随去。但是，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内，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加之，征兵的数量大、时间紧、要兵急，思想动员不充分，优抚政策不落实，尤其是役政人员舞弊与应征对象不合理，专征无钱无势的贫苦男儿入伍，征兵也遭到很多应征人员与家属的强烈反对，到处出现役政人员强拉壮丁入伍的现象，给本来就很贫困的人民造成了不少家庭的悲剧。

无论是志愿从军还是强征入伍的县民，一旦他们成为一名抗日军人，就集国恨家仇于一身，在抗日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力拼搏，以血肉之躯去换取国家和民族的胜利。据内江县政府档案记载，抗战中，报回到县政府的阵亡将士名单的有 810

人。实际上，真正阵亡者不止此数。最近，内江市东兴区政协收到上海市政协一封信，要求查找内江县人罗彬的史料。上海方面掌握罗彬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松沪保卫战中担任连长，与日寇作战，英勇顽强，中弹牺牲的史料。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准备在新建的上海抗日纪念馆中陈列罗彬的英勇事迹，故请内江县补充罗彬本人及其家庭史况。但内江县抗日阵亡档案却未列罗彬之名。由此可见，一个连长阵亡都未收入本县抗战阵亡烈士名单，何况一般士兵。抗战中，内江儿女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是很多的，彭先赧可算其中之一。他在内江县中毕业后，随叔父彭西秀去广州，考入航空学校，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空军一大队二中队领航员，对日作战，屡立战功，两次受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的嘉奖。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彭先赧值勤，交班之际，忽传升空作战命令，他即驾机起飞，直凌武汉，完成轰炸日军高炮阵地的任务后，正欲返航，被日机追至围攻，坐舱中弹，机坠东湖，以身殉国，时年 29 岁。

四、唤起民众千百万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推动下，内江一批爱国志士，积极发起抗日救亡运动，组建抗日救亡团体，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具体地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唤起民众，激发县民的爱国热情，以全力支援抗日战争。首先，县政府及机关法团负责人发起成立了内江县抗敌后援会和动员委员会。接着，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县长陆维周应地方绅耆的要求，本着“报刊新闻容许官民合作”的精神，成立了《内江

日报》董事会，陆维周被推为董事长，谢明霄等14人为董事。董事会敦聘刘兴梓为报社社长，冉蕴明为总编辑，张得刚为主笔，詹沐臣为经理。《内江日报》在《发刊词》中，宣布“以激发人民爱国之心”为首要任务，要“逐一刊布忠勇将士之奇迹，各地民众之应援，与乎领袖之言论行动，转输于乡村保甲，务期全县人民，咸晓国家之现状，国家利害与个人利害之关系，而后望其竭尽人力财力物力，以报效于国家”。《内江日报》日发一千份，采编人员以极大的热情，大量报导抗战消息、内江抗日救亡活动情况及各界人士抗日救亡的文章，这对增强县民的抗战意识，推动内江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九三八年，是内江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一年。三月十三日，内江商界中的热血青年，组织成立了“三、一三”剧社。尔后，由中共四川省委派回内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吴汝翊、中共内江特支书记谢碧芳（女）等人先后筹组了兴华剧社、孩子剧团等抗日救亡团体，他们的活动开展得更为有声有色。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内江县抗敌后援会及动员委员会联合各机关、法团、学校及救亡团体，举办了抗日救亡宣传周，晚上，举行火炬游行，参加者两万多人，列队三里许，抗日救亡歌声、口号声直冲云天，为内江破天荒之壮举。

在抗日战争中，就全国而言，是国共两党合作，然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却不准共产党组织及共产党员公开活动，就是秘密活动，亦被禁止，一旦发现就有被关监杀头的危险，故而称共产党为地下党。但共产党组织与共产党员，以抗日救亡大局为重，用其他合法身份参加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动员内江民众，作出了历史的贡献。一九三八年四月，地下党员廖友陶，以教师身份推导沱江中学

女生部组织讲演比赛，选拔抗日救亡宣传员，他集中而明确地向女学生们讲解抗日救亡的主要论点，增强她们的抗日热情和演讲信心，然后带领宣传员到离城 30 华里的白马镇作抗日救亡宣传，收到良好效果。七月，地下党员吴汝翔，通过敦睦小学训育主任张盛彩，串联内江部分教师和学生，成立了以张盛彩为社长的四川省内江县兴华救亡歌剧社。剧社设 7 个股，有 4 个股的负责人是地下党员，歌咏股的负责人就是中共内江特支书记谢碧芳。吴汝翔还通过白马镇学生 温余波，成立了以温余波为团长的内江县第四区孩子战时宣传团（简称孩子剧团）。孩子剧团成立的当天（八月四日），即在白马庙文昌宫演出《大义灭亲》、《一个孩子的梦》等剧，受到观众的热情赞扬。孩子剧团除在内江各地演出外，还带着《血祭‘九、一八’》、《三江好》等剧和《流亡三部曲》等歌曲，徒步上成都下重庆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沿途演出抗日救亡节目。他们行程 2000 余里，演出 200 多场，宣传民众约 10 万人次。孩子剧团在成都，受到冯玉祥将军的接见，冯玉祥称赞他们是“教育老百姓的小先生”，秦光银特作《献给内江孩子剧团》的诗一首：“有群小英雄，胆壮志又宏。同行八人，一女七男童。”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自贡中心县委派闻化鱼回内江，担任中共内江特支书记（谢碧芳任委员）。他以《内江日报》副刊编辑和沱江附小教师的身份，直接参加兴华剧社、“三、一三”剧社的编导、演出与宣讲工作。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兴华剧社与“三、一三”剧社，利用农历三月三日高寺香会的机会，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闻化鱼于演出间作时事报告，数千观众无不感动。兴华剧社还积极开展宣讲、教歌、采访、办壁报、搞募捐等活动，并把宣传的重点放在农村，曾利用节假日，三次下乡

巡回演出。他们下乡演出都是自带行李、道具，自费安排生活，一天步行数十里，先后到东兴、稗木、一洒滩、永兴庙、观音滩、平滩桥、华山、石子、田家、黄连铺、白马庙、凌家场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抗日救亡歌剧，深受民众欢迎，剧团走到哪里，哪里就激荡起抗日救亡的热潮。

正当内江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人民群众迅速觉醒的时候，国民党不顾抗日大局，害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参与国统区的抗日救亡活动，会危及他们的统治，便千方百计要将抗日救亡团体，纳入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管理轨道。当孩子剧团在成都用“莲花落”的形式演唱了《八路军》这个节目，省动员委员会就叫他们去“谈话”，要把孩子剧团纳入动员委员会管辖，遭到孩子剧团当面拒绝。国民党内江县党部以种种借口，决定将兴华剧社纳入县党部直管，遭到拒绝后，又强行将其与十四补训处成立的血潮剧社合并，又遭兴华剧社反对，乃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下令将其解散。就在这一天，兴华剧社到稗木镇演完最后一场《屈原》归来，召开了有 20 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并合影留念。接着，“三、一三”剧社、孩子剧团，亦先后被迫停止了活动。一九四一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内江亦在一月三十日也大肆搜捕共产党及进步人士，同时，加强对新闻机构的控制与检查。《内江日报》被国民党内江县党部接办，时任报社社长苏洪宽被强令下台，报社中抗日救亡活动分子闻化鱼、梅英、吴天緱、黄世杰等均被迫离去。此后，内江民众从《内江日报》上，很少见到本地新闻，很少见到内江人民抗日救亡活动的报导与正义呼声；看到的国际国内新闻，均转中央社稿，省内新闻大都是从成渝两地大报上剪来，宣传的内容，不是“国家第一、民族

第一”，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不是“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就是“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等等。

五、含辛茹苦大生产

在封建的土地制度下，多数农民没有土地，主要是佃地耕种，辛亥革命后，这种状况并无根本改变。据《四川省农情报告》记载，一九三八年，内江县自耕农占 23.42%，半自耕农占 18.02%，佃农占 58.65%。由于战争与剥削等原因，佃农迅速增加，到一九四二年，自耕农占 17.5%，半自耕农 16.2%，佃农占 66.3%。据《四川经济月刊·租佃问题调查》，一九四六年，自耕面积占 23.34%，承佃面积占 76.66%。抗战期间，大幅度增加的田赋粮食征收量，大都通过地租等形式，转嫁在农民头上。据史料记载，一九四〇年的税款总预算为 2089 万元（旧币），比上年增加 3.8 倍；粮食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四年半中，全县实际交纳的现成粮 131 万石，总征量在原征银的基础上增加 4 倍。广大农民除被征兵外，还要被征工，据《内江县工役分配调查表》记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征调民丁 5466 人，历时七天，采办公路碎石租沙 138264 立方；一九四〇年一月起，先后征调民丁 4555 人，每人服役 12 天，主要做采办公路碎石租沙和翻修公路、铺压路面等强劳工作。在大批男儿应征杀敌和应调修路的情况下，在家的男女老少，承担了全部土地耕种任务。他（她）们为了抓住季节，不误农时，争取好收成，总是睡半夜，起五更，顶烈日，冒霜雪，朝朝日日地辛勤劳动；他（她）们为了交纳地租、赋税与杂款，总是精打细算，节衣缩食，过着“租粮作糊糊，汤菜半年粮”的日子。当时的政

府为了发展生产,亦采取了一些鼓励农民兴修水利,改进技术,推广良种等措施,并发放贷款扶持。一九三七年,中国银行同四川省合作委员会商定,把内江县作为中国银行农贷示范区,通过当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与蔗糖生产合作社,对蔗农贷款。次年,放贷 36 万元。一九三九年,大春作物喜获丰收,稻谷产量达 232.3 万市担,比上年 187.4 万市担增加 24%。一九四〇年二月,县政府在资圣寺甘蔗试验场召开内江县第一次劝农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乡乡长、保长、甲长和农民代表 9146 人,县长谢明胥主持开幕式并作劝农报告,动员全县人民努力生产,支援抗战。大会还举办了粮食作物、工艺作物、甘蔗生产、制糖技术、农业化学、森林园艺、畜牧兽医成果七个陈列馆,陈列展品 1056 种,开展 4 天,参观者达 59146 人次,为内江农业史上之创举。这年,经广大农民的艰苦努力,全县甘蔗种植面积达 12.5 万亩,产量达 43.8 万吨,分别比战前的一九三六年增加 33.3% 和 86.5%,创造了民国时期的最佳成绩。甘蔗的发展,促进了制糖业的兴盛,全县产糖清 58230 吨,白糖 11005 吨,桔糖 6100 吨,红糖 3025 吨,与一九三六年比,分别增加 109%、86.7%、87.5% 和 86.7%。

广大酒精生产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了战胜日寇封锁而造成的能源紧缺,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以桔糖和糖蜜作主要原料,制造动力酒精。一九三八年二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同四川省政府联合投资 10 万元,在裨木镇雷板滩兴建四川酒精厂,请中央大学教授、著名酒精专家魏岩寿负责筹建。魏教授带领金贞观、王正朝、章永锡、李永捷、谭湘凰、陆永川、陶端格、李钰清、孙增在、李伯延、朱家钰、金贵铸等大专院校毕业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以和前线战士一样的战斗精神,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攻破了一个个技术设备上的难关，仅用一年时间，建成了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安装的第一座成套的、能连续生产高质量、高浓度的酒精设备，实现了中国酒精史上的大突破。四川酒精厂建成投产后，日产酒精 3000 加仑（折合 10 吨），用作汽车燃料，效果良好。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新运日报》以“酒精汽车，改造成功，不渗汽油，照样爬山越岭”为题，报导酒精生产与汽车改造成功的喜讯。接着，军政部在白马庙建立军政部酒精厂，资源委员会又与中国银行、新华银行及私人合资在三元井建立中国联合制糖公司酒精厂。一九四〇年底，由王仲绥集资，在蛤蟆石建立中国胜利酒精厂，以土酒为原料，最高可日产酒精 7000 加仑，以糖蜜作原料，最高可日产酒精 2000 加仑。一九四一年，任宗德出资，在脚板沟建立国防动力酒精厂。虞槐安、张秉震、唐体仁、曾荷君、晏济元、李恭楨等，先后分别集资建立中兴酒精厂、辅仁化学工业社、蜀丰实业有限公司、同昌酒精厂、成永酒精厂、泰昌酒精厂、中川酒精厂等，另外，还有西川、建华、同春、裕民、光轮、蜀川、茂市、云蒸、京华等小酒精厂。到四二年末至四三年初，全县酒精的最高日产量可达 20200 加仑，酒精业成为当时内江最兴盛的新兴工业。据内江县政府统计室统计，一九四二年产酒精 4762576 公升（1 公升=0.5 公斤），一九四三年产酒精 7105008 公升，比上年增加 49.2%，占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酒精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地球牌”酒精，质量居全国第一。

为支援前线，赶运抗战所需的粮食、食糖、酒精、钢铁厂矿石等物资，内江广大航远工人，时常得到“十万火急”的命令被征调，担负抗战物资运输任务。他们经常日夜兼程，闯险滩、辟

恶浪，及时将物资运达目的地。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四川省船舶总队沱江区第二大队第一中队，由肖承伯负责征用船舶，三年中，共征军用船舶 4000 余艘。一九四〇年，军政部因兵工署钢铁厂开工，征调大木船 100 只，柳叶船 200 只，去綦江抢运矿石到重庆。一九四二年，内江县民航公会派王树声等人率船 12 只，为航空委员会从泸县运输汽油 88 桶、润滑油 82 桶，到石桥港起卸。一九四三年，应军事急需，调木船 100 只，为交通器材第 58 库赶运酒精至泸县，先运 5000 桶，继运 3000 大桶，再运 3300 大桶（本来，内江港有木船 3000 多只，4000 多吨位，但因军用物资运输量大，有时民船适用者不敷征用。一九四三年十月，国民政府交通部造船处在内江设立工程处，于南门外河坝盖起工场，赶造大木船 100 只，专供运输军粮。）

六、日机轰炸罪滔天

一九四〇年，侵华日军在集中兵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的同时，加紧实施在国民党统治区“逼蒋投降”的阴谋计划。鉴于四川天险，日陆军难于进逼，乃用其强大的空军力量，以武汉为基地，对重庆、成都及其它战略要地，进行狂轰滥炸和“疲劳轰炸”。内江城既无防空守备力量，又无防空避弹设施，为了应付日空袭，城中中级学校疏散到乡村上课，并建立了民众自救形式的防护团和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一段时间，日机虽然多次从内江上空掠过，县民跑了几次警报，但却未遭轰炸，一些人就认为日机不会炸内江，产生了侥幸心理与麻痹情绪。其实，日寇正是用这